



冯春龙 著

中国近代 十大出版家



冯春龙 著

中國近代十大出版家

年表
1911-1949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 冯春龙著.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5.11

ISBN 7-80694-137-1

I. 中... II. 冯... III. 出版工作者-列传-中国-现代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899 号

书 名 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著 者 冯春龙

责任编辑 马 琳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凤凰桥街 24-6 号 邮编 225002

发行部电话 (0514)7343427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 / 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137-1/K·63

定 价 20.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祁龙威

予尝读老友俞君筱尧佳作《书林随缘录》，流连讽诵，想慕我国近世出版界诸多仁人志士，为中国文化事业之进步，立下不朽之功。所惜其书所记系随缘鳞爪，语焉不尽。于是告爱好我国出版史之冯子春龙，嘱赓俞君之作。未及二年，喜见春龙斐然成章，所著《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已脱稿。

所列十人为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张静庐、徐调孚、赵家璧。始于戊戌维新志士，迄于新中国文化元勋。我生虽晚，但犹及见其中叶圣陶、张静庐等先生。至于书中所涉及之顾颉刚、郭绍虞、丰子恺等其他文化名流，亦曾获捧手问教，所以读之倍感亲切，得益非浅。

春龙有意续写金灿然等前辈出版事业。深望筱尧兄等出版界老人，能予以赞助，早观厥成。犹记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华书局整理《张謇日记》时，曾亲见金灿然总编辑与赵守俨兄组织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等专家学者点校二十四史。书局对专家生活备极照顾，出必车，食必鱼。而金总编辑却自奉甚薄，每天在大食堂排队买饭，啃大白菜。老前辈之廉洁仪型，值得后人矜式。

我识春龙二十年，深敬其能在纸醉金迷、酒绿灯红之中，保持清醒，淡泊利禄，折节读书。已届中年，犹毅然至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日进，行日修。所有此一切，均足征其志趣远大，智虑过人，异日定能为国家人民立功建业，其前途将未可量，愿与春龙共勉之耳！

二零零五年八月

时年八十有三

目 录

1	序
1	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
29	陆费逵——雄才大略创“中华”
57	王云五——商务出版巨匠
89	章锡琛——开明出版第一人
119	叶圣陶——教育出版家
149	邹韬奋——拓展进步新“生活”
179	胡愈之——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207	张静庐——出版家兼出版史家
235	徐调孚——作者的知音
259	赵家璧——独具慧眼的文学编辑
289	后记

张元济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出版家、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著名作家茅盾晚年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写到:“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政变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南下上海,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事、董事、董事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成为解放前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化出版重镇,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解放后,仍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兼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早年京官生涯

张元济因其父张森玉长期在广东任职，并一度出任广东会同、陵水等县知县，所以他在广东度过了童年时代，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4岁时，随母亲回浙江海盐老家。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参加壬辰会试，一举获得二甲第二十四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被分发刑部，任贵州司主事，后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章京，主要负责文书事务，他是当时章京中唯一通晓“洋文”的人。正当张元济顺利走上仕途，准备施展自己才华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告败，并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甲午战争的溃败，深深刺激了满怀壮志的张元济。正如6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面对国家主权的日益沦丧、政府的昏庸无能、官场的黑暗腐败，张元济忧虑不已，他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实行变革，“以鼓舞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才”。他的“鼓舞人心”就是指创办报刊，设立书局，以启发民智。“培植人才”主要指创办学堂，以培养“贯通中西，兼知他项西学”的人才。当时，他的好友汪康年正在上海与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报》，张元济予以了热情支持，时常提出建议，并且积极承担了该报在北京的发行工作。另外，他还积极鼓动汪康年在上海开办学堂，声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并与汪康年相约：“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从这时起，张元济的人生理

想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把自己的精力逐步转移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致力于培养和教育现代人才方面来了。

1895年冬，张元济和陈昭常、张荫棠、周汝经、夏偕复等人组织了一个学习会，取名“健社”，学习“有用之学”，即西学。除了学习西学知识外，还相互勉励，力戒颓废和消沉。接着，张元济又与友人创立西学堂，合聘教习，设馆教授英文。先后来馆学习的有20多人，张元济本人也参加了学习。1897年，张元济与夏偕复、陈懋鼎、王仪通联名呈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设立通艺学堂，并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通艺学堂的创立，是张元济一生中非常重大的事件，他几乎投入了自己所有的情感和智慧，以求实现新的人生价值。他在所拟《通艺学堂章程》中指出：“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之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学堂开办之初，除了教室之外，还设有图书馆、阅报处。按张元济的计划，一旦经费许可，还将设立实验室、仪器房、博物院、体操场、印书处等。可见他对通艺学堂的筹划用心良苦。通艺学堂开始只招了20余名学生，后来增至四五十人。学堂还邀请严复来校讲学，以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后来，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通艺学堂就此夭折。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决意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著名的“百日维新”的序幕。6月16日，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张元济和康有为等人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帝向张元济询问了通艺学堂的情况，张元济予以一一答复。整个召见，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关于光绪帝召见一事，张元济在1949年9月，应《新建设》杂志之约，撰写了《戊戌政变的回忆》一文，对此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当时的规定，非四品以上官员，是没有资格得到皇帝召见的，而身为六品的张元济能获此破格殊荣，一则是因为徐致靖的保荐，另一方面大概因

身为章京的张元济，经常为光绪帝传送新书，光绪帝对其名字早已熟悉。不过，通过这次召见，张元济已敏感地觉察到“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不足”，“旧党之阻挠”，从而对维新变法的前景感到担忧。

同年7月，光绪帝谕令创设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前身），并把官书局和译书院一起并入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大臣。孙提议张元济出任大学堂总办。虽然张元济有志于献身教育，培养人才，启迪民智，因考虑到孙家鼐“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所以，思量再三，“极力辞退”。

9月，张元济有感于变法的艰难，经过深思熟虑，给光绪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的主题是“时局艰难，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整个奏折约7000字，其中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系统阐述了张元济对维新变法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智慧 and 情操。在总纲中，张元济提出了“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等建议，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许多大胆的积极性构想。

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垂帘听政，光绪帝被软禁瀛台，这样，持续103天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紧接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开始了血腥镇压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刘光弟、杨锐等六君子不幸被杀，侍读学士徐致靖、礼部尚书李端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张荫桓等被捕入狱。作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张元济等人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革职后，经李鸿章的推荐，张元济南下上海，来到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出任南洋公学下属译书院院长一职。从此，张元济结

束了六年的京城仕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投身商务印书馆

1899年，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出版工作，扩大译书院的译书范围。在这期间，他曾主持出版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等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锁米尔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书籍，一改原先南洋公学译书院主要出版军事书籍的惯例。半年之后，公学总理何梅生病逝，他还一度接任总理职务，促成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如期开学，积极筹办特班教育，聘请蔡元培为特班总教习。但因为与南洋公学监院（西文总教习）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旋即辞去总理兼职，专任译书院院长。此间，他还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外交报》。他在南洋公学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他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坚定了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信念。

1901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投资商务印书馆。第二年，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加入商务，主持商务的编译出版工作。1903年又亲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从此，张元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献给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为我国近代文化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集资合办。这几位合伙人原先都是印刷工人，熟悉排字技术，但文化程度不高。商务起初的业务主要是承接商业账册、票据以及教会的印刷品，是一家小型的印刷所。其中，夏瑞芳身兼数职，既是总经理，又担当校对、财务、采购、送货等具体事务。当时

国内新式出版机构的规模都较小，由于几位合伙人的勤奋和团结，商务起步阶段还算顺利。1900年，更以廉价盘下了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书馆，获得了一批较为先进的印刷机械设备。同时，出版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华英字典》等书籍，为商务印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联系书馆印刷业务的过程中，夏瑞芳结识了时在南洋公学任职的张元济，并对张元济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大为敬佩。而张元济在与夏瑞芳的接触中，认为夏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过人的气魄，其合伙人勤奋进取，工作踏实。对于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来说，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迫切需要精通图书出版、学贯中西的人才，而翰林出身、具有维新思想、学问道德俱佳的张元济先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1901年，张元济、印有模入股商务印书馆，使商务印书馆的总资本达到5万元。1902年初，在夏瑞芳的诚邀下，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的职位，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并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持教育为己任”。

执掌商务编译所

张元济答应加盟商务印书馆时，曾与夏瑞芳商定，夏管印刷、发行，张元济负责编书。加入商务之后，张元济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普及知识、传播文化、启迪民智的图书出版事业之中，并且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出版史上的至高地位。他首先倡议设立编译所，并聘请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担任首任所长。1903年，蔡元培因与爱国学社内部分歧（一说与“苏报案”有牵连），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准备赴德国留学，张元济自己亲任所长，直至1918年9月辞去所长一职，交由高梦旦接任。在编译所所长任内，他广招贤才，充实编译所力量，大胆启用新人，

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小型印刷所一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出版图书最多、实力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在他的邀请之下，高梦旦、杜亚泉、庄俞、蒋维乔、章锡琛、陈叔通、叶圣陶、蒋梦麟、杨端六、周昌寿、邝富灼、陶孟和、竺可桢、沈雁冰（茅盾）、胡愈之等一批学有专长的文化人陆续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另外，还聘请了日本教育家小谷重、长尾桢太郎、加藤驹二为编译所顾问。这些文化人的加入，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进行学制改革。新学制的出现，迫切需要大量与之相适应的新式教科书，这为商务印书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张元济先生在这一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儿童启蒙读物几乎都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之类，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这些读物已经远远不适应教学的需要。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式教材，如浙江澄衷学堂编印的《字课图说》、南洋公学出版的《蒙学课本》、《物算教科书》、《本国地理教科书》等等，但这些教科书都存在许多缺陷，影响也不大。

据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先生的研究，商务是从1903年开始编写教科书的。起初，夏瑞芳购入译稿数十种，因质量问题而无法销售。后蔡元培建议采用“包办”的方式，由蔡元培拟定方案，聘人分别编写，但最终也未成功。蔡元培先生离职后，张元济决定组织力量，采用合议制的方式，贯穿由浅入深、尊重学生心理特点的编撰思路，编写国文教科书。他先后将蒋维乔、高梦旦聘入编译所，以日人小谷重、长尾桢太郎为顾问，集体讨论，集体编写，集众人之智慧，终于于1904年4月推出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1册。蒋维乔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当时之参加编辑者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略似圆桌会议，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

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

《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1册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广泛反响。仅五六天时间，开印的4000册销售一空，大大出乎编写者的意料。至1906年，《最新国文教科书》全套10册出齐。

张元济在主持《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同时，还亲自编写《最新修身教科书》和习字帖。《最新修身教科书》含初小10册、高小8册。张元济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说：“人之恒言曰德育、智育、体育，诚哉德育为万事根本。无古今、无中外一也。我国古籍之言道德者，不可胜数。然高深之理论，奇特之事迹，非乳臭者所能骤几。本编采取古人嘉言懿行之切近者，以为模范。间借寓言以启发其兴趣，而为惩戒之助，或亦言德育者所不弃欤？”

《最新国文教科书》依照学制，按年级、学期，分科编写，形式新鲜、活泼，顺应了新式教育的要求，赢得了教科书市场的很大份额。另外，为了便于教师讲授，每一册教材均配有“讲授法”，相当于教师参考用书，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深受教师的欢迎。这一开创性的做法，为后来各出版机构编印教科书所模仿。

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102种，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教科书有54种，占书目总数的一半以上。教科书的成功出版，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从此，教科书一直成为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张元济执掌商务编译所期间，非常注重教科书的修订和完善。他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能够根据学制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不断对既有的教科书进行修订、重编，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教育理念。到1911年，《最新教科书》系列达69种之多，其中还包

括专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两种。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推出《中华教科书》,一举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国内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局面,成为商务有力的竞争对手。为了应对被动局面,张元济立即组织力量,在《最新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形势需要的《共和国教科书》,及时扭转了不利局面。1919年,以文学革命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编辑出版了白话文的《新体国语教科书》,接着又出版了《新法国语教科书》。1922年,全国采用“六三三”学制,商务又编辑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北伐胜利,又推出了《新时代教科书》。正是在张元济先生的精心组织和努力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一直以高质量、高水准处于国内教科书的领先地位,执教科书市场之牛耳,同时,也为普及教育、传播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组织编辑、出版教科书之外,张元济在编译所所长任内,还积极组织汉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的出版。他引进了杜亚泉、郑贞文、周昌寿、高觉敷、段育华、周建人等一批科学家和学者,出版了《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无机化学命名草案》等一批自然科学著作,其中《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更是我国当时科技类丛书中最大的一部,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昌寿在《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文中,将明末以来我国汉译科学著作分为三个时期,指出其中第二、三时期汉译科技书籍约有963种,多数是1936年前翻译出版的,而商务印书馆成就最大。正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绍曾先生所说,这些译著的出版,大都出于张元济先生的精心挑选,是张先生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张元济也是十分重视。编译所组建不久,他就邀请留日学生,翻译日文社会科学书

籍,并按专题出版了一批丛书,如以政治为主题的《政学丛书》14种(包括《万国宪法比较》、《万国国力比较》、《宪政论》等)、世界历史为主题的《历史丛书》8种(包括《亚美利加洲通史》、《希腊史》、《东西洋伦理学史》等)、战争为主题的《战史丛书》5种(如《普奥战史》、《意大利独立战史》等),其中有些书是国外刚刚出版的,商务通过翻译出版,及时介绍给国内读者。1903年起,出版了《说部丛书》5集,共收翻译小说400多种,这是我国较早组织翻译外国作品的一部大丛书,其中不少出自著名翻译家林纾、伍光建等人之手。后来又将林纾的译作从《说部丛书》中抽出,以《林译小说》为名单独结集出版,广受社会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早在京城任职期间,就与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开始了交往,其后与严复一直书信往来。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曾以优厚稿酬约请严复翻译《原富》一书。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又请严复翻译了《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6部西方名著,加上先前出版的《天演论》、《原富》,并称“严译八大名著”,其中有些译作再版多次。严译八大名著的出版,对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辛亥前,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日本法规大全》80册和《列国政要》32册,为国人了解世界开阔了视野。

张元济还非常重视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当时,随着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适合学生使用的工具书可谓凤毛麟角,大多数人不得不沿用诞生于200多年前的《康熙字典》。1908年,高梦旦在广州结识了对辞书有着独到见解的陆尔奎,遂向夏瑞芳、张元济引荐,征调陆氏入商务编译所,主持字典编纂。经过近5年的艰苦努力,《商务印书馆新字典》终于在1912年问世。这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汉语字典,在中国工具书出版史上具有

重要的意义。编纂《新字典》的同时,在张元济的亲自规划下,由陆尔奎、高梦旦、方毅担当主编,张元济等 50 人任编委的《辞源》编纂工程启动。此项工作前后历时 8 年,使用资料达 10 万余卷,耗资 13 万元,所收单词 1 万多个,词目 10 万条,终于在 1915 年 10 月大功告成。《辞源》的成功出版,不仅凝聚了张元济和商务编译所同仁们的心血,更是我国辞书编辑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汉语辞书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辞源》出版后,颇受社会各界欢迎,并一再修订重印,至 1949 年,累计发行达 400 万册,创造了民国时期大型工具书销售的奇迹。另外,张元济还组织力量编印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等。他还非常重视编纂、出版双语工具书,物色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编写任务。1908 年出版了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这部辞典分精装上、下册,收词(不包括派生词)68000 个,还附有 10 页彩色插图和 5 个附录,“集华英诸合璧之大成”,几十年畅销不衰,影响甚广。严复在为该辞典所写的《序》中盛赞:“搜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则用是书者,将自得之,而无烦不佞之赘言也。”

后来,商务还出版了郭秉文、张世鏊主编的《汉英双解韦氏大辞典》,黄士复等主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张世鏊、平海澜等编著的《英汉模范字典》及潘序伦编的《会计名词汇释》等专业词典,前后总计约有 30 多部。这些工具书的出版,打下了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工具书出版重镇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优秀工具书。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的组织和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满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没有长远文化眼光,没有慧眼独具的人才观,没有出版家兼文化人的魄力和胆识,出版这么多大部头的工具书,实在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